

02
'94.3

(总第六十三辑)

要 目

- 吴大任自述
- 忆先父郑诵先先生
- 乒坛忆旧
- 我是怎样培养训练马文革的
- 天津“鬼市”探秘
- 六十年前的天津估衣街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津)新登字 001 号

执行编辑:杜文彬

版面编辑:康 明

校 对:李国丽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4·3(总第六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144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1-02140-0/G·990

定价:4.00 元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4·3(总第63辑)

往事追忆

我的自述 吴大任(1)

人物纵横

忆先父郑诵先先生 郑必达等(34)

我的父亲卢木斋先生 卢毅仁(48)

回忆卢木斋先生 何宗谦(58)

忆古琴大师张子谦 陈嘉瑞(62)

商海话旧

天津集市贸易的历史沿革 王英奎(72)

六十年前的天津估衣街 谢鹤声 刘嘉琛(87)

天津“鬼市”探秘 胡蕴辉(98)

天津“鬼市”琐忆 李洁贤 薛寿颐(107)

解放前后的辛集皮革市场 赵惠忱(112)

2630/20

乒坛忆往

- 乒坛忆旧 敖石朋(117)
忆三十年代华北乒乓球埠际赛 张文桂(131)
我是怎样培养训练马文革的 张 斌(141)
我所知道的三十年代天津乒乓球运动 张澜生(152)

津城变迁

我国河口第一个大闸

- 海河防潮闸兴建纪实 陈培烈(158)
海河工程局与整理海河委员会 郭振华(164)
天津市政排水工程建设史话 唐鸿德(173)

史苑珍闻

- 两本珍贵影集 张鸣珂(57)
六十年前的乒坛盛举——津沪之战 张文桂(157)
天津北站体育场 闻 史(86)
解放后天津的经纪人 柴俊铨(106)
西关街小道子棉布业 郝宝聚(116)
黄河六次大迁徙 陈隽如(163)
- 封面照片说明 (97)

编者按：吴大任先生是著名的数学家、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天津市科协名誉主席。曾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本文翔实、生动地记述了吴先生个人自幼年求学起奋斗的一生。在征集此文过程中，曾得到原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天津市委顾问委员会常委王金鼎教授多方面鼎力协助，努力促成完稿，特致衷心地谢意。



从小学到中学

我是广东肇庆人，1908年生于天津。祖父和父亲都是前清科举出身，祖父早故。辛亥革命后，父亲经营过工商业，而更多的是从事文教事业，当过天津旅津广东学校校长，主编过高要县县志。

在天津，我上过一年小学。和我一同上学的有比我大一岁的哥哥大业和二叔的儿子大猷，大猷比大业小半个月。1915年因我母亲病重，我家搬到广州，不久母亲去世，又搬到肇庆。那时我有三个姊妹，是前母所生，同母的有大业和三个妹妹。和我住在一起的还有祖母和一个早寡的姑母，姑母是高要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18年，我父亲娶了继母，她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我

的

自

述

☆

口
去
大
任

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共有三兄弟九姐妹。

在肇庆，我和大业上高要县立模范小学，1919年毕业。我印象较深的小学教师中有一位是陈禹范，他是校长，教过我们《论语》、英语，还教会我们四声和反切。这点启蒙的音韵常识对我后来欣赏文学作品和写作很有好处。他还能讲纯正的国语，在广东人中，当时是很难得的。

在假期，父亲总要我们两弟兄念古文，并背给他听，后来又背了《孟子》。小学毕业后，父亲让我们上了半年私塾，接着又让我们到广州上私塾。和小学相比，我对私塾反感很大，但父亲是很严肃的，只能服从。在广州，我们念《左传》，阅读《通鉴纲目》，也念些散文和唐诗。每天写大字，每六天作一篇文章。我们一共上了两年私塾，消磨了锐气，只是语文有所长进。

我家里有一箱旧小说，我差不多都看了。广州的私塾老师不许看《三国演义》以外的小说，但我们向同学借来偷偷地看，有些小说是不健康的，但看小说能够增长常识和词汇，提高表达能力。

1921年，我父亲再次到天津谋生，带了大业、大猷、我和大立，大立是四叔的儿子，比我小四个月。我们都考上南开中学，四个人住一间宿舍，年龄、个子都差不多，很引人注目。

在一年级，我最感吃力的课是英文，课本是《五一轶事》。我的英文基础很差，无法跟上。幸而一位在大学上三年级的表哥定期来宿舍帮我，一两个月后我才逐渐跟上了，考试也勉强及格。没想到学年末送给家长的成绩单上，却盖上一个戳子，上面写着“该生本学年品学均有可称，请贵家长鉴察”。大猷成绩单上也盖了这个戳子。

一年过后，父亲感到他的收入无法供四个学生上学。这时祖母因大猷幼年丧父，就负担起他的费用；大立因母亲患喉癌回了广东；父亲的一个朋友负责我的费用。这样，父亲就只管大业一个人。从这时起到1926年高中毕业的四年间，我用的就是父亲这个朋友

的钱。他使我能继续学习，我对他是感谢的。除每学期的学宿费 45 元外，他每月还给我 10 元。这对我本来是够用的，但他的钱有时给得不及时，我又不敢向父亲要，所以经常负债，给我造成很大的困难和思想压力。

1922 年，南开中学改三三制，我上初中三年级，英文虽然还不好，及格已经不再是勉强了。上高中一年级时，我遇到一次挫折，第二学期的一次小考中，化学和西洋史都不及格。主观原因是我那一年比较贪玩，对这两门课学习又不努力；客观原因也是有的，开学时，我钱不够，化学课用的是英文原版书，比较贵，我没有买，因而没学好。西洋史用的是中文教材，这本书很怪，完全用表格方式来表述每个历史事件，如原因、经过、结果等等，此外不带任何说明。本来我对历史还是有兴趣的，但我不愿意死记硬背。小考两门不及格，对我敲起警钟，以后这种失误就不再出现了。可是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对西洋史的印象至今仍是模糊的。

除此以外，在高中时，我的学习成绩是稳步上升的。特别是上高中二以后，我的学习变得主动多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也许是因为英语基础已逐步巩固，我对它的兴趣也高了，而英文又是当时的重要学习工具，对学习别的课是很有帮助的。

我喜欢课外阅读，经常到图书馆翻书看。那里书不多，却有两套大百科全书，一套是大英百科全书，一套是美国的，我只是无目的地乱看。此外，我印象较深的是吴稚晖写的《上下古今谈》，是用问答式写的，其中关于天文部分使我大开眼界，我第一次了解到宇宙间有那么多新奇事物。

课外体育活动，我喜欢打网球，但没有师承，不会发球。我也打乒乓球，用宿舍里的书桌当球桌，上面放几本小英文书当球网，虽然打得好，却不能上大桌。

那时反对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是较多的，除了“五七”国耻游行外，又遇到“五卅”和“五三”运动，我们上街宣传、募捐、抵制日

货。

1926年,我中学毕业,是保送免试上南开大学的三个毕业生之一,我们还得到免学宿费四年的待遇。学费每学期30元,宿费15元,所以一年共节省90元。

在南开中学的五年学习,为我日后成长奠定了较好基础。德、智、体诸方面都有收获。

这里可以补充一点,1925年大猷考上南开大学矿科一年级,大业考上南开大学预科,一年后升本科。所以那一年我们弟兄三人中,只有我还留在中学。

在南开大学

我上大学之前,父亲那个供我上学的朋友去世了。幸而四年的学宿费都免了,而且我在大学又两次获得理学院的奖学金,那本来也是免交学宿费,但因我已经得到中学的免费,所以那两年每学期就发给我现金45元。此外,有两个暑假我到中学暑期学校教书,每次有大约50元薪金,还免饭费。我还为姜立夫先生抄写数学名词,干了半年多,每月有10元报酬。这样,在大学期间我的生活费有2/3可以自给,解除了经济问题在我思想上的压力。

当时南开大学奖学金制度是这样规定的:达到一定条件的才能获得奖学金,但每个学院每学年至多授予一个。奖学金是根据前一年学年的成绩评定的,而授予的形式是免下一年的学宿费。1926年因矿科停办,大猷转入物理系,他得到1926~1927和1928~1929两个学年度的理学院奖学金,我得到1927~1928和1929~1930的奖学金。

上大学时,我认定我宜于学物理,就入了物理系。南开大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除体育外,每人可选五门课,成绩好的可以选六门。所以一年级上学期我就选了体育、中文、英文、微积分、物理和

定性分析。下学期又加了地学通论。那年姜立夫到厦门去了,教微积分的是专长中国数学史的钱宝琮,教物理的是饶毓泰,而最引起我兴趣的是邱宗岳的定性分析和竺可桢的地学通论。邱先生是物理化学专家,讲定性分析非常细致深入;竺先生的地学通论讲了不少的天文,而我对天文早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在 1931 年暑假,我就到图书馆大量借阅无机化学和天文的书。

在二年级,我选了饶先生的理论力学和现代物理,饶先生对基本概念的阐述比较深入。在理论力学班上,学生有陈省身和吴大猷,饶先生对这班学生的成绩很赞赏。现代物理全面介绍了当时实验物理的新成就,使我大开眼界。一次,饶先生让我看他老师密利根所作的测定电子质量和电荷的实验报告,并且让我在班上介绍,他听了很满意。课外,我常到理科阅览室看美国的物理杂志《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我看到密利根关于他发现宇宙线的报导和他对宇宙线来源的最早分析。那时宇宙线还没有定名,我写了一篇短文《大字中的高频辐射》,在我负责编辑的理科学报上发表(理科学报是理科学会的小报,而理科学会是理科学生的群众组织)。饶先生拿了这份学报在班上连连说好,显然有点激动(这是他第二次这样赞赏,第一次是学报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光之追越》)。

尽管我对物理兴趣很高,但在上三年级时我还是转到了数学系。原因有三个:第一,饶先生身体不好,不能再开许多课。第二,二年级时我还选修了交流电和无线电两门课,它们本质上都是工科课程,其中理论不难,但我对实验操作兴趣不高。我认识到,我对物理的兴趣主要在理论方面(对化学也有类似情况,我对定性分析兴趣很高,学定量分析,因为理论简单,兴趣就大减)。第三,姜立夫先生回来了,我选他的微积分和立体解析几何都是学年课。可是到了下学期姜先生让申又枬接他教立体解析几何,他自己另开学期课投影几何。在选课时,理学院院长饶先生不让我继续选立体解析几何,要我选投影几何(我不能都选,都选就是七门课了)。我知道

这是姜先生的授意,就选了投影几何。姜先生讲这门课也确实精采。这样,数学系对我的吸引力就超过了物理系。不过,我对理论物理的兴趣依然很高,我是怀着对物理的惜别心情和对饶先生的深深歉意转系的。在三年级,我仍然选学了饶先生开发的电磁学理论。

三年级我选修了姜先生的高等代数和复变函数论,它们不是几何,但是作为几何专家的姜先生讲这两门课总是密切联系着几何背景和几何应用,因而讲得活。四年级,我选修了姜先生的微分几何、 n 维空间几何和非欧几何,这些都是姜先生的专长。学了那么多几何课,我的兴趣自然就集中于几何。至于姜先生教学质量之高,教学方法之灵活多样,我已写得不少,这里不重复。可以一提的是,我的微分几何听课笔记,姜先生后来打印发给以后的同学作为讲义了。

最后两年,我还学了两年德文,一年法文。这两种文字的数学书我都能阅读了,这对我后来的学习生活起了很大作用。在英国时,我需要看意大利数学文献,有了英、德、法文的基础,我又自学了意大利文,很快就达到能阅读的水平。

课外时间,我继续看小说,也看了孙中山著作。我仍然打网球,不打乒乓球了,却喜欢“弹棋子”,那是用手弹的克朗棋,我弹得很好。

1930 年我大学毕业,那年毕业生中有三个列为最优等,除我以外,还有陈省身和张志基。张志基和我中学同班毕业,同时被保送入大学,他学化学。大业同年在商科毕业,也列为优等。

中山、清华和南开

大学毕业后的前三年,我的生活是不安定的,一年换一个地方。1930 年春,一个偶然事故使我父亲失业,他回到肇庆。那年清

华开始招收研究生，我想报考，但我父亲要我就业，担负赡养大家庭的义务，这是我不能违抗的。不过我仍然报了名，怀着抑郁心情参加了考试。我和陈省身都被录取了，还有每年 320 元奖学金，那是完全够用的。但我只好向清华申请保留学籍，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中山大学有两项工作供我选择：一个是农学院讲师；一个是数学天文系助教。讲师比助教薪金多 60%，而我选了助教。我以为那对进修较为有利，而且他们还告诉我，将来有到法国学习的机会。

对那里的助教生活我不满意，进修条件很差，实行坐班制，时间难以利用，出国希望更是渺茫。因此过了两三个月，预科兼高中部一位教师因病请假，找我去兼一门课，我就接受了。那时我已清楚地看到，与其在中山大学工作下去不如积累一点钱留给家里，以便脱身到清华。寒假后，预科兼高中部找我去做专任教师，我就辞掉助教职务去教课，那里的报酬比助教几乎多一倍。我还兼了一个月的化学课，又短期在一个补习学校教物理。最后，我还向我大姊借了 1000 元，用暑假期间翻译了一本书，准备将来用稿费还债。我留给家里的钱，估计足够家里三年的费用，这样我可以到清华研究院念三年书。

1931 年秋季我到清华复学，又和陈省身同班。在清华这一年也不理想，我选了四门课，可是那年“九·一八”事变后学习不安定，更重要的是，我的导师给我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明显没有科学意义的。所以，当 1932 年姜先生叫我回南开做助教时，我马上接受了，中断了研究生的学习。

在南开，我除了批改两门课的作业外，还把姜先生的投影几何课上我记的笔记整理成讲义发给学生。

这一年我还得到科研的初步训练。德国汉堡大学的中年教师斯佩尔纳(E. Sperner)在北大讲课，姜先生知道他让北大的青年人看一篇文章，就让我也看。不久，斯佩尔纳来南开大学访问，姜先生

把我介绍给他。他告诉我，那篇文章应当改进，让我试试。我根据他的思路作出了初步成果，他很满意，约我1933年秋季到北大任教，我也同意了。

1933年6、7月间，报上消息说，中英庚款董事会招考第一届留英公费生。在我还没有决定报考时，姜先生认为我该报名。他说：“你的机会很好，他们叫我出数学考题，我没有同意。”我完全领会他这句话的涵义，就报考了。考得不好，但居然录取了。第一届中英庚款公费生有20个名额，这次一共只录取了9名学生，其中数学一名。9月间，我们9人坐船到法国马赛登陆，转到伦敦。

在 国 外

我们到伦敦时，英国各大学都已开学。一个英国人负责为我们联系学校，我希望到剑桥大学，他却忙于解决容易联系的学校。别人都要上学了，他还没有替我联系，我很着急。一个从法国来的中国学生陈传章正在伦敦大学大学学院进修，他主动替我联系该学院，我就在大学学院注册为博士研究生。

入学以后我才了解，大学学院有两位几何学家。我除了听课外，他们都指定我看参考书。中英庚款董事会规定，公费三年，第三年可以转到别的国家。我希望两年得到博士学位，第三年到德国。可是在大学学院一年快过去了，导师们都还没有给我提出研究课题。这样，我就没有把握第三年到德国去。我想，宁可放弃博士学位，也要到德国去。那时陈省身已经到了德国的汉堡，我写信和他商量。他告诉我，汉堡大学有三位高水平的教授，可以指导当时的任何数学研究课题，于是我就在大学学院申请改为硕士研究生。

1934年秋季，两个导师分别给了我硕士论文题目。按规定，一篇论文就可以了，做两篇是为了保险。过了半年，两篇论文都已基本完成。数学系经常有科学报告会，在会上，我对这两篇论文分别

作了报告，颇得好评。其中一篇，我没有用稿子或者提纲，还解答了会上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报告后，系主任说：“在习明纳尔上不用讲稿，是惊人的成就。”他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我的一位导师还表扬我在黑板上保持整洁。会后有不少人向我表示祝贺。

论文答辩时，除导师外，还有剑桥大学来的两位专家。他们提出的问题，我都分别作了回答。答辩后，一位导师告诉我答辩通过，可以得到带有表示成绩优异的星号的硕士学位。

我在英国的两年是有收获的，但远不是理想的。我的经历使我形成两点看法：1、学习一定要尽可能到师资强的地方去；2、到一个单位学习之前，最好对它有充分的了解。

1934年陈鹍在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于3月到了英国，我们结了婚，她也被大学学院接受为研究生。因为时间不够，不能读学位，就选修了几门课。她到伦敦的旅费是借的。在国外的费用，两人和一人差不多。

1935年7月我们到了德国汉堡。德国大学只授予博士学位，已经取得硕士学位的人，至少还要过一年半才能取得他们的博士学位。因为我只有一年的学习计划，我们就都作为访问学者在汉堡大学听课。我们可以利用数学系的图书馆，参加系里的各种活动。我同时跟勃拉舒克教授研究积分几何，这门学科是新创立的，勃拉舒克和他的学生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勃拉舒克每周要带领他的追随者绕市里一个大湖散步，散步时可以交谈，也可以做学术交流，我参加了。勃拉舒克给我看了他刚出版的关于积分几何的小册子，我读了以后，他先后给了我两个小题目去做，我把做的结果向他汇报，他都表示满意。

1936年春季，我了解到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申请研究补助。我申请了，得到了补助，可以继续留德一年。暑假后，勃拉舒克给了我一个较有份量的研究课题，我做出以后，他满意地说：“你进行得这么好，我很高兴。”接着他问我为什么不拿

学位，我说：“我只有半年时间，来不及了。”因为开始办理拿学位的手续，至少还需要一年半。勃拉舒克又给我另外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比前一个意义重大，别人做过，但没有做出来。过了两三个月我做出了圆满的结果，他听了我的汇报，看了我的草稿说：“你几乎把一切都做完了。”他再次问我：“你论文都有了，为什么不弄个学位？中国人不是很重视学位的吗？”原来，论文是取得学位的主要依据。我告诉他，“我在德国只有两三个月了，没有时间了。”

在汉堡两年，我听了三位数学大师的课，参加了一些学术活动，会见了欧洲各国的一些数学家，是很有收获的。但也有很大的遗憾，那就是，我没有注意收集资料。回国后，又遇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看不到国外书刊，这就造成我和数学前沿工作的极大差距。

1937年我接受了武汉大学聘约，我们原订了意大利船票，6月下旬动身回国，因该船被意政府征用，而其他国家船票都贵得多，就改乘下一班意大利船。我们利用这一个月时间在意大利休息旅游。在此期间，我和陈鹗合作开始翻译一本德文数学书，后来用这书稿费归还了陈鹗上大学时的借款。在船上听广播，才知道国内发生了卢沟桥事变，而且平津已经沦陷。原来在意大利时我们没有看报，不知道。到香港和广州这天，正是8月13日，上海抗日战争爆发。

抗 日 战 争 期 间

我们到武汉不到半年，武汉大学就决定西迁四川。一个夜晚在珞珈山上，我们看到敌机飞过，炸汉阳兵工厂，又看着它们飞回。学校停课，我们先到宜昌，在那里又遇到敌机轰炸。是年阴历年后到了重庆。后来武汉大学决定迁乐山，我们就到乐山，在乐山呆到1942年，在那里遇到两次敌机滥炸，炸得很惨。

抗战期间国外期刊来不了，很难进行前沿研究，我主要就是讲课。我讲课的面很广，学过的教，没学过的也教，边学边教，借教课来拓宽和加深我的基础。当时，我自学能力还较强，这样做还没有遇到困难。但由于用力不专，个人收获不很大。

科研方面，我也写了一点东西，水平不高。我和陈鹗把在意大利开始翻译的德文书译完，又译了另外一本。前一本是用白话文译的，后来出版了，据说是第一本白话文数学书。后一本用的是文言文，没有功夫整理，没有出版。直到八十年代，我根据这书改写补充后的新版，改用白话文重新翻译，现在已经被出版社接受，尚未出版。

当时的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教育部长朱家骅曾经两次来信要我到同济大学，第一次要我当数学系主任，第二次要我当理学院院长，我都没有接受。西南联大的江泽涵也两次来信要我去，我也没去。第一次是因为陈鹗怀孕在身，第二次孩子出生不久。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安于现状，怕坐长途公共汽车。

我既怕耽误业务，又怕卷入人事纠纷，只是埋头教学和科研，不参与学校事务。1942年，我的房东逼我搬家，我们到处找房子，都是功败垂成。那时四川大学在乐山西80里的峨嵋山。正在我们走投无路时，四川大学理学院许多骨干教师因派别斗争离校，许多课开不出来。暑假开始，川大理学院院长周厚复来乐山请武大教师假期中去讲课。为了图短时的头脑清静，我去教了两门课。与此同时，陈鹗在乐山继续奔走，仍然徒劳无功。周厚复了解到我们房子出了问题，就要我们两人到川大任教，并且答应专为我们盖宿舍。我想：武大我呆不长，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抗战可能较早结束；又羡慕峨嵋风光，能朝夕与它相对，也是快事。我就同意去，既解决了房子问题，又可以畅游峨嵋。

我结束川大的课回到乐山，武大一些领导人知道我要到川大，就挽留我。理学院院长桂质庭还怕我把武大的人拉到川大去。我

向他保证，绝不拉走武大的人。许多学生也来挽留，但我去意已定，不便更改。当我们一切准备好将要动身时，教务长朱光潜也来挽留，并且同意教授宿舍盖好后留一幢给我们。我们不愿意让人们认为我们走是要夹要房子，因此再三讲明要走的理由，朱光潜只好同意放我，并和我谈妥，让我在武大告假一年。

川大数学系原有三位教授，其中一位是兼系主任的柯召，都已离校。我到川大，首先是重整教师队伍。我为系里添聘了一位教授，把柯召请回，又增聘了一位川大刚毕业的学生为助教。在柯召到校前，我只好代理系主任。

刚刚安排就绪，川大校长换了黄季陆。他是国民党四川省省党部主委，省党部设在成都，他要把学校搬回成都。我们只好告别峨嵋搬到成都去。不久柯召返校，仍任系主任。

1942年夏，武大朱光潜来成都招生，约好我同船回乐山。我把行李都收拾好，只等上船。没想到我到图书馆还书时，被学生发现报告了黄季陆。他和我在成都的姑母、姑夫是熟朋友，他立即拉了我姑母来我家，硬把我们请到饭馆吃饭。那时，我姑母正闹家庭纠纷，需我调停，在他们两人再三劝说下，我勉强同意留下，未能回武大。

武大回路已断，我只得安心在川大。过了几个月，柯召任教务长，黄季陆让我接任系主任，我不接受。他让我当理学院院长，我更不同意。我愿意专心搞业务，所以历来拒绝出任行政工作，代理一个学期系主任，完全是不得已。在旧社会，人事纠纷复杂，更使我视行政工作为畏途。没想到1943年发聘书时（当时聘书每年一发，不发聘书即停聘），我的一位得力助教（武大毕业生，比我早一年到川大）没有得聘书。我找到了黄季陆，指出她是全系最强的助教，停聘她不合理。黄说，现在精简人员，首先是精简非川大毕业生。我据理力争，黄也自知理由不充分，就作了让步，同意把她聘为师范学院助教。我知道再争无益，只得同意。这事进一步使我感到，川大

比起武大更不是我可以久留之地。

在川大，我授课情况和武大相似，但较集中。当时好几个教会学校都搬到成都，和华西大学联合办学，我在那里兼过课。1944年11月，中国科学社在成都开年会，我在会上宣读了三篇论文。那以后，成都数学界部分人组织了不定期的科学讨论会，在会上我作了两次报告。

1945年抗战结束，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抗战胜利；忧的是国内政治斗争尖锐，前途未卜。果然，川大校内出现特务学生伪造进步教授的大字报，贴出来后还拍了照，目的显然是要迫害他们。这引起教师们的气愤，大家联名给黄季陆写信要求开除两个特务学生，我和陈鹤也都签了名，黄季陆虽然被迫开除了他们，但马上又把他们送到庐山受训，这表明川大的政治环境已非常险恶。部分教授酝酿组织教授会，酝酿方式是到茶馆喝茶，我也在被邀之列。教授会成立，我被选为理事。

1946年春，上海交大教师罢教，抗议薪金菲薄，生活无保障，川大教授会开会响应。黄季陆到会发表讲话，使罢教议案被否决。教授会认为这不代表多数教授意见，决定用联名签字方式发动罢课。由我起草了简短的罢课声明，其中有这样的两句话：“对远地的同道表同情，向黑暗的现实提抗议。”结果教授会成员签字的远远超过了半数，实现了罢课。

过了些时候，许多大学纷纷复课，有几个学校约我去任教，其中一个燕京大学。我对教会学校有点成见，但喜欢北京，也就同意了。接着南开大学也来信约我，我当然愿意回母校，就辞去燕京聘约，同意回南开。

我在武大五年，川大四年，都没有能培养出和我研究方向一致的学生。主要原因是我本人研究工作开展不够，方向不专，教课庞杂，不系统。另一个原因是时间都不够长，当我亲自培育的学生即将成熟时，我就离去。这样，我就未能培养出能够和我合作的助手，